

李壮鹰

主编

李春青

副主编

中举古文编释林

清代上卷

本卷主编

党圣元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李壮鹰 主编

李春青 副主编

中華古文編釋林

清代上卷

本卷主編

党圣元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古文论释林. 清代上卷/李壮鹰主编;党圣元分册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301-19280-1

I. ①中… II. ①李…②党…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理论—中国—清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5741 号

书 名: 中华古文论释林·清代上卷

著作责任者: 李壮鹰 主编 李春青 副主编 党圣元 本卷主编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280-1/I·237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13.375 印张 376 千字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总 序

李壮鹰

多年以前,我们就曾经发心:在一个较宽的范围内,选取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发生过影响的一系列重要理论经典,撰成一套大型的古文论选注本。这不仅能为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学习者、研究者提供一个基础性的依据和参考,也可为当今的理论建设总结历史资源。为了实现这一夙愿,我们在2004年申请了此项研究课题。本课题有幸获得了广大学界同仁的认可和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被列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现在,放在我面前的这套《中华古文论释林》十卷稿本,就是这个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在书稿即付剞劂的前夕,关于本书的指导思想、学术意图和编撰体例,有几句话需要简单地说明一下。

古文论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迄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与其他学科相比,在整体水平上还存在着差距。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整个研究局面总给人一种声势有余而底气不足的感觉。研究者虽然在方法、视角上力图出新,但在理论发掘上却少有实质性的突破。不少论者醉心于“宏观”的考察、“体系”的营造,他们不肯花些工夫去深入地钻研古人的具体论著,而是浮在空中,手持瞭望筒,这儿瞄一下,那儿瞥一眼,对古文论只得到一些支离破碎、模糊朦胧的印象,便敢以金鸡擘海、气吞山河之势笔扫千年,横发议论。在他们居高临下的“视野”之下,可轻而易举地缔构出一幅幅“概貌”,继而演绎出一条条“规律”,最后总结出一套套“理论”。这些论者视物,颇有堂吉珂德骑士的特点:来自客观者少,而出于主观者多。他们的眼睛不管收纳,只管放射,故往往看朱成碧,指鹿为马,甚至于凿空为有,无事生非,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飏于静树。览其大著,构篇虽颇宏阔,发思不乏杼轴,但论述却总显得浮泛、空疏,缺乏稳固的支撑。原因何在呢?其实说起来很简单:病在不学而已。大抵治学,尤

其是治古学,对古人原典的阅读和释义,本应该是所有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我们的这些研究者却漠视甚至干脆脱离了原典,像明清实学家笔下的心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也正因为他们的研究不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而是从先入为主的某种理论出发,则所著除了以“创作”来代研究,凭想象去“画鬼魅”,别无他途,此孔子所谓“思而不学则殆”也。打个比方,古文论研究好比建塔,而对原始文本的准确解读应该是这座塔的根基。可我们的有些研究,“塔”造得很高,但愈来愈觉不稳,摇摇欲坠,最后惊视脚下,才发现原因盖出于塔基之不牢:因为他们的整个研究是构建在对古人文本的误解上的。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的研究中,误解原典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从整个学界来讲,此种倾向作为一种学风,其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就古文论研究这个特定领域来讲,它与我们长期以来忽略了研究所应凭借的基础建设有直接关系。当然,此种状况,也与古文论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有关:古文论所由产生的古代文化背景与现代相异,古人所用的思维方式和阐述方法上与现代不同,而这些都决定了古代的理论与现代的理论话语之间不可能简单地通约。在这种情况下,如不把古人的理论文本放回历史之中去精读、把握,偏差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明清之际的学术史上,为矫正理学、心学的空疏浮泛,曾经有一次规模浩大的实学运动。学者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发扬“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实证精神,从而有力地矫正了长期的学术积弊,大大深化了对古代文化的研究。现在看来,前代学者的实学路径,对深化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为了扭转古文论研究的空疏浮泛之风,为研究注入活力,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学界重新提出“回归原典”的口号。在本项目中,我们力图发扬前辈学者的实证精神,通过对古文论经典文本的仔细考索、认真解读,重新找回被我们忽略或抛弃的古人的“本来的思想”。同时,我们也想通过这个课题研究建立起一种理念,即恢复文本本身在古文论研究中的本体地位。也就是说,所有历史上的文论论著文本,绝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古文论研究的

“材料”，而是古文论研究之旨归。因为所谓“材料”，是可以随意取舍、砍削，用以营构别的建筑的工具。而历史文本却不然，它不能是工具，而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本身。如果说，任何真正的学术研究在本质上都不过是一种文本解读，那么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就尤其是这样。它所直接面对的，应该是古人关于文学的论著文本，整个研究不但必须以这种文本阐释作为基础，而且应该作为核心。脱离了文本，其研究必将丧失客观性、科学性，从而沦为凌空蹈虚的游戏。

应该说，在重视文本的搜集、整理方面，以往的古文论学者一直有很好的传统。因为古文论相对来讲属于比较新的学科，而我国的文章著作原本又极其零散，故上个世纪学科草创以来，古文论的研究一直伴随着对古代文学批评论著文本的整理。这工作可分为两方面，一是搜集，二是注释。前辈们关于古文论论著的搜集整理，为我们的项目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也应该看到，以往的选注本，由于受社会形势、思想认识和文化视角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选材的范围、理论的辨析、观点的评价等方面还都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故已不能很好地适应今天的古文论学习者和研究者的需要。我们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充分吸纳前辈的学术精华的基础上，同时也能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对当前古文论研究的空疏、浮泛之风有所匡正。

《中华古文论释林》共分十卷。第一卷：先秦两汉文论；第二卷：魏晋南北朝文论；第三卷：隋唐五代文论；第四卷：北宋文论；第五卷：南宋金元文论；第六卷：明代文论上卷；第七卷：明代文论下卷；第八卷：清代文论上卷；第九卷：清代文论下卷；第十卷：近代文论。各卷都按照时代的顺序，精选了本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文学论著文本，对各篇文本给予仔细的考订和阐释。本书选文的标准注重纯文学和美学的角度，突出建设性的理论。不过因为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始终较为宽泛，文学思想的表述也往往伴随着具体的作品的评论来进行，故这方面的著作不可能完全剔除。古人的文学观念是逐步清晰的，对文学规律的探讨也是逐步细化、渐渐深入的，这也就决定了选

文分量的分配,中古以前选材较少,中古以后选材渐多。而对评注分量的安排,正与此相反:中古以前时代较远,不少的命题和概念又属初次提出,故诠释和辨析需要多费一些笔墨;唐宋以后则诠释从简。《释林》每一卷前都设有前言,概述本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介绍文学和文论发展的脉络。每篇文本阐释都分为理论评述、文义疏证、附录文献几方面内容。理论评述一般放在选文的题注中,简要概括本文的文论思想,揭示其社会思想背景,评述其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本书的注释不止于疏通文义,而是在疏通文义的基础上,把力量集中在对理论精神和思想内涵的阐发上。对于文本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命题和概念,不是简单的今译就能谈清楚的,我们就索性铺开摊子,从文字考源、语义追溯、史实的辩证、论理的剖析等等角度进行较详的阐发,力图把隐于概念之中的深刻的思想、真实的意蕴开掘出来。这一工作,与前文所讲的过度阐释的流行病不同,它是一种必要的解剖或稀释。古文论的有些概念,好比核桃一样的果实,它外边包着坚硬的壳,要吃它,需要费些力气把它剖开,仔细地把嵌在壳里的果仁剥出来。它又像陈年丹药,因为它浓得化不开,故需要注入足够的清水来加以稀释。在这种剖剥和稀释的过程中,我们既立足于文本本身的阐发,又特别突出了注释的开放性。以往的注释,大都只强调对文本的导入,著者多将具体的文本视为一个孤立的、封闭的屋子,故解读和阐释只限于文本之内。而我们则把文本看成是一个窗口,它之中的每一个命题,都是时空经纬复杂关系中的交汇点,它既承接着历史,也反映着现实,又开启着未来。一句话,它连接着许许多多文本之外的东西。因此,对于解读者来说,文本既是一个特定的世界,又是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故对文本的阐释,不能只是导入,也要导出,要使注释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基此,我们在注释中,努力做到点、面结合,论、史结合,疏、证结合,文意的释诂与观点的评述结合,集注和新注结合,辑评与新评结合。注意适当运用上挂下联、触类旁通的方式,以使读者通过领略文本而获得一个立体的历史时空感。——这一点,可能算得上是我们在注释思路上对以往的突破。

考虑到我国古代文论在外在理论形态上的零散性,我们在每篇

(或每组)选文后面又选了若干有关材料作为附录,以供研究者参考。这些材料,有的是同一作者的其他论述,结合选文来读,可窥出作者的思想全貌;有的是历史前后对选文中有关问题的不同论述,可帮助读者把握某种特定理论的发展过程;还有的是后人对选文理论的评论,可帮助读者了解选文的影响和在文论史上的地位。总之,我们通过每篇附录的参考篇目,还是想为读者提供走出文本的链接途径,使人们看到部分之外的整体,零散背后的关联。

原典文本的准确可靠,是正确阐释、科学研究的前提。古代文论的文本与所有的历史典籍一样,在漫长的流布、传写过程中,有版本上的讹误、改窜甚至伪托等等问题。这些情况会严重影响对古人真正思想的把握。过去的选本在这方面多是忽略的。本课题在阐释文本时,首先以文本的考订校勘为基础。尤其对中古以前的论著,我们不仅尽量挑选善本入选,而且在文中列出重要的校记,以帮助读者对文本原义的斟酌揣摩,在审慎的比勘之中求得定谳。

本书各卷的选注工作,是由多位学者分工完成的。选文的篇目、编著的指导原则和大致体例,是经过反复协商而决定的。各卷初稿交来统一协调后又经过分别的修改润色。因每位执笔者的学术品格终有不同,故在原则体例大致相得的前提之下,也保留了每一卷的个性,相信这样做只会加强,而不会破坏全书的整体感。当然,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下的工夫还不够,全书各卷都会有疏漏、失当甚至谬误之处,诚挚地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课题研究成果,在整个研究和出版过程中都得到了部、校、院、中心等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资金襄助。北京大学出版社也为本书的出版作了辛勤而细致的工作。谨此并致谢忱。

2011年4月22日

前 言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代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以及文化学术颇有几分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的文化、学术以及文艺,虽未能走出传统的樊篱,但其封建王朝终结者之身份和境遇,却也成就了它总结者的功绩,具有了某种集大成的性质。这其中既有客观的政治时代因素和统治者文化政策的深刻影响,也是文学本身发展演进的结果。由于时代政治的不同,清代的文学批评可以明显分为明清之际和清代盛中期及清代晚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成就不一,风貌迥然。就成就而言,除传统诗文词批评之外,清代戏曲小说理论批评显得尤为突出,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 清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总体特征

清代文学理论批评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显示出了不同特色,成就也有明显的区别。由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差异,明清之际的几十年与清代盛中时期的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不同。几位思想家的富有启蒙色彩的进步主张,以及几部卓越的理论著作的出现,使得清代前期的文学批评成就斐然。清政权稳定以后,文学创作和批评都繁荣起来,但统治者政治文化政策的强烈干预,使得盛中期的文学批评虽流派纷呈但色彩单调。

明清易代的社会动荡,造就了一批博大精深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他们大多具有坚定的民族思想和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在文学批评中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并致力于对明代文学进行总结与批判,从而使得明清之际的文学批评成为清代文学批评中最有价值、最有成就的一个时期。作为由明入清的遗民志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无不经历了山河陵谷、国破家亡的惨痛。面对清廷的血腥镇压,残酷屠杀,他们在以各种方式的反抗斗争失败后,沉痛之余,

便开始深思和总结明亡的教训,矛头直指程朱理学甚至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在文学批评中反映出来,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有了某种启蒙的色彩。顾、黄、王等人,在从思想意识形态上总结明亡教训的同时,对明代文学的弊端也进行了总结和批判,进而提出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学主张。与此同时,金圣叹、李渔、叶燮等人的文学批评,则更注重文艺理论系统的构建和思考,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影响深远。这样,现实思想内容和文艺理论形式的各有侧重和并行互补,使得这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较之前代和清代盛中时期便显得尤为深刻和系统。总体说来,明清易代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清廷的血腥镇压,遗民志士惨烈的民族抗争以及深沉的亡国之痛,对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最大,也让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就更加卓越和突出。批评家、思想家们在对明亡教训进行总结的同时,也对明代复古与反复古两种文学思潮产生的流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这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特征之一便在于总结历史、批判现实和重视真情实感。

清初政局稳定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政权稳固的经济、政治措施,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局面。同时,为了巩固和维护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固,统治者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文学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宣扬忠孝观念。为了巩固清廷的统治,康熙不仅屡下诏书,倡导程、朱理学,如重刊《性理大全》,编写《性理精义》,辑印《朱子全书》,重用理学名臣等,还亲自学、讲程、朱理学,使得程、朱理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御用哲学。此外,还通过祭孔庙、谒明陵以及旌表明室忠臣、谴责贰臣降将等诸多加强忠君的封建伦理观念方法,以达到消弭传统思想中的“夷夏之防”。这就是康熙所谓的“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其次,开设博学鸿儒科和编集图书。为了笼络汉族文士,转移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注意力,清廷除了增加科举的录取名额外,又通过开设博学鸿儒科来搜罗山林隐逸,学者名流如朱彝尊、毛奇龄、陈维崧、施闰章、汪琬、尤侗等人纷纷应选。他们大多以官高位显的朝廷重臣身份,对统治者的文艺政策心领神会,竭力奉迎并大肆宣扬,从而左右着文学思潮的基

调和走向。与此同时,统治者为了点缀盛世鸿业,笼络汉族缙绅和士人,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来编纂各种书籍,陆续组织纂修了《明史》、《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图书,由此影响了一代学风。其中很大一部分文人学者不同程度地投入于学术活动,皓首穷经,潜心学问著述,形成了乾嘉考据学兴盛的学术文化局面,进而对文学创作和批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反映在文学理论批评上则表现为注重学问,以经史为根底。当时的一些学人,如施闰章、朱彝尊等,都对此作过突出的强调,这也强化了诗文创作批评中忽略现实生活内容、沉浸于故纸堆和重视考据学问的创作倾向。再次,删削焚毁书籍,大兴文字狱。清统治者在文化上采取了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不但有上述的怀柔利诱,还有与之相辅相成的血腥镇压。一方面大规模地删削、焚毁一切于他们统治不利的书籍,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以禁锢人们的思想言论。文人往往因“疑似影响之词,横受诛戮”,从而导致思想文化领域一片恐怖。广大文人士子如临深履薄,动辄触动时忌,诛连九族,思想学术和文化文学都被纳入到清廷的预定规范之中,无任何自由可言,这也成为治学方式走向嗜古考据的原因之一。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虽然流派纷呈,颇为热闹,却不折不扣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文学政策。

在这一系列文化政策主导下,清最高统治者也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主要有提倡文以载道、温柔敦厚以及清真雅正等。关于文以载道,康熙要求文章“务使阐发义理,裨益政治”。雍正云:“文以载道,与政治相通。”乾隆亦云:“文词本属游艺末节,然亦须根柢经训,有裨身心,方为载道之文……朕所好者载道之文,非世俗徒尚虚车之文。”历代皇帝这类记载不可胜数,无疑对清代盛中时期的文学创作批评基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于温柔敦厚,《四库提要》中论《唐宋诗醇》的编选目的曰:“然《诗三百》尼删所定。其论诗,一则归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关于清真雅正,如乾隆三十四年四月癸酉上谕所云:“将欲一洗陋习,归于清真雅正。”方苞奉敕编选《钦定四书文》,其《四库

提要》云：“我皇上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是编所录，一一仰禀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

在统治者这些文化、文学政策的引导下，清中叶诗文词领域出现了诸如“神韵派”、“格调派”、“肌理派”、“桐城派”、“浙西派”等等文学流派，这些文学流派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主张都不同程度地与清廷对文学、学术的规范和倡导保持一致，或主清真雅正，或倡温柔敦厚，或远离现实而只重视艺术形式，或顺应时政所需而宣扬伦理教化，总之都被纳入到清廷设定的文化、文学政策轨道之中。由于创作上的繁荣，一大批名著的出现，这一时期的戏曲、小说理论也有许多创获。如围绕着《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的评点之学，以及《李笠翁曲话》、《花部农谭》等戏曲论著，都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其时的小说、戏曲理论批评，虽然说没有超过明清之际的金圣叹、李渔等人的成就，但也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道光以后，盛极一时的清王朝迅速地衰落了。经济的严重衰退和统治阶级的极度腐朽，促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再度激化，加上农民起义不断，清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与此同时，文人们的经世意识又渐渐抬头，因此文学批评中也开始出现要求干预现实的思潮。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们的词论追求比兴寄托和微言大义，曲折地反映了这种时代心理。

清中叶以来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风起云涌，论争辩难此起彼伏，这既深化了清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成就，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最为发达、最为辉煌的标志之一。如以王士禛的“神韵派”、沈德潜的“格调派”、翁方纲的“肌理派”、袁枚的“性灵说”等为代表的诗论，以姚鼐的“桐城派”、恽敬和张惠言的“阳湖派”等为代表的文论，以朱彝尊的“浙西派”、陈维崧的“阳羡派”为代表的词论，等等，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宗唐宗宋”之争是清代诗坛的重要论争之一，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清代文学批评史和学术史，使“宋诗派”成为有清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文学流派之一。清代散文方面的重要论争当属骈、散之争，这不但使得骈文在唐宋古文运动之后一直遭

到贬斥的情形有所改观,出现了李兆洛、阮元等著名骈文批评家,而且让“桐城派”古文成为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此外,戏曲领域的“花雅之争”等也对戏剧创作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

清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最大特征就是它具有了某种集大成的总结性质。关于清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集大成功绩,郭绍虞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概述清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特征时分析总结得最为透辟:“清代学术有一特殊的现象,即是没有他自己一代的特点,而能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即以文学论之,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或制艺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没有一种足以代表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不仅如此,清代学术再有他特殊的成就,即是不仅各人或各派分擅以前各代之特长,更能融化各代各派各人之特长以归之于一己或一派。……则清代的文学批评,更可称为集大成的时代。”可谓言简意赅,深刻地道出了清代文学批评的总体成就和特征。

二 诗 论

在亲身经历了家国的沧桑巨变之后,一些由明入清的文人思想家在反思明亡教训的同时,也对有明一代文风、学风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判。他们在比较全面地总结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优缺点的同时,结合当时社会动荡、民族危亡的现实,强调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补救了明代空疏浮泛的学风,开启了清初文学创作和批评注重诗教的传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明清之际激烈的时代动荡之中,大多数遗民文人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重视时代对文学的影响,倡导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经世致用,注重文学本体和文学内容方面的探讨。黄宗羲非常重视时代对于作者的影响,他强调:“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逮夫厄运厄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郁郁遏,垒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谢皋羽年谱游录注

序》)他认为汉之后魏晋、唐天宝后与宋末是中国文学的三个最有成就的时期,原因“无他,时为之也”(《陈苇庵年伯诗序》)。钱谦益感慨于明王朝的灭亡,强调动乱的时代和不幸的文人遭际对于诗歌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如称曹植《赠白马王彪》、阮籍《咏怀》等诗乃“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胡致果诗序》)。这与黄宗羲所见相同。顾炎武则强调文章“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日知录》卷十九),推崇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认为这是“知立言之旨者”(《日知录》卷二十一《作诗之旨》)。

对明代文学发展进行全面批评总结,是明清之际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在诗论中表现得尤为充分。遗民文人思想家如钱谦益、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通过对明前后七子以及公安派、竟陵派创作得失的深刻反思,反对模拟,提倡独创,重视真性情,要求回归诗教传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总结了有明一代诗歌发展的历史,对前后七子的模拟因袭进行了严厉批评。如指责李梦阳“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李攀龙“影响剽贼,文义违反”等。他十分重视文学的独创性,对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自袁宏道之论出,七子之复古模拟风气方得以廓清。钱谦益对“竟陵派”的攻击尤为猛烈,他在钟惺小传中说道:“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他很重视文学的社会现实意义,认为“诗人之志在救世,归本于温柔敦厚一也”(《施愚山诗集序》),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向“诗教”传统的回归。黄宗羲不赞成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之说,如在《张心友诗序》中云:“余尝与友人言诗,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诸于外,若异域然?即唐之时,亦非无蹈常袭故、充其肤廓而神理蔑如者,故当辨其真与伪耳。”他论诗重视真情之自然流露,认为“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明文案序上》),强调“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的不同,反对公安派对“情”不加任何约束,要求“情”要有普遍的社会现实意义。王夫之不满前后七子复古模拟的文学思想,并且反对门户派别之分,提出了“心之元

声”说,肯定“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观点,主张作家要有独创性,所谓“王、李笼罩天下,无一好手敢于立异,中郎以天姿迥出,不受其弹压,一时俗目骇所未见,遂推为廓清之主”。他对公安派在肯定的同时也有所批评,不赞成公安派之流于“俗诞”,要求把“曲写性灵”与“动人兴观群怨”相结合,表现出了向传统诗教回归的特点。他对竟陵派也有所批评,认为其收录的艳诗不符合“诗教”之旨。顾炎武极力反对明代的模拟剽窃之风:“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通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而得其皮毛者乎?”(《日知录》卷十九《文章摹仿之病》)“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盗窃。”(《日知录》卷十八《窃书》)提倡独创,所谓“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卷十九《文章摹仿之病》)。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他说:“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体代降》)提出了似与不似的辩证原则,并且强调“诗主性情”(《日知录》卷二十一《古人用韵无过十字》),不能以文辞“欺人”。总之,这些遗民文人,不仅对明代文风做了深入的批判和总结,而且扭转了明末以来的不良学风,对有清一代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代诗论有鉴于明代前后七子学唐而产生的流弊,标新立异,转而学宋,形成了“宗宋”思潮和“宋诗派”,并贯穿有清一代,势头强盛,影响深远。当时宗宋情势如纳兰性德《原诗》所云:“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钱谦益和黄宗羲开风气之先,前者学苏轼、陆游,后者则极力标榜黄庭坚。其后对宗宋风气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主要有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宋荦、查慎行等。其中,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三人编有《宋诗钞》一书,这部宋诗选本对宗宋思潮的形成具有特别意义。在有清一代宋诗派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康、雍、乾时期,以浙派诗人和批评家用力最专,人们也往往将浙诗派与宋诗派视为一体,而浙诗派最重要的诗人厉鹗的诗论也构成了该阶段宋诗派诗歌理论的主干。学宋诗也产生了一些流弊,如因散文化、口语化成分增多而导致语词俚浅等。所以,当时对学宋诗持非议者就大有人在,如姜宸英

《汪中允秦行诗略序》云：“目涉浅薄，率已自是，无论市儿村姬骂街诮室俚鄙之说，皆强取而韵之，谓之为诗，此学究之陋，借宋人以自诿者也。”

这个时期在诗学思想上最具理论体系并作出重大贡献者，是王夫之和叶燮。王夫之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一位擅长思辨的理论家，“情景论”是其对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最大贡献。王夫之论诗，不像宋元明时期的一些诗论家们那样褊狭肤浅地仅从格律句法上教人如何一虚一实、上情下景或上景下情，而是始终不离诗歌主客体关系，始终站在美学高度，同时又紧密联系诗歌创作和作品的实际来立论，探讨“情”与“景”如何臻于情景交融的具体创作途径。情与景这对范畴像一条红线贯串着王夫之的整个诗论。叶燮的《原诗》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严羽《沧浪诗话》之后，我国古代文论史上又一部较有严密理论体系的诗话著作。《原诗》分内篇与外篇。内篇上卷主要是针对明代以来诗坛主复古与主创新、宗唐与主宋各执一偏、弊端互生迭出的状况而发言，旨在探寻诗歌的原理，为诗歌创作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内篇下卷则是创作论，从创作的主客观条件入手，提出了创作的客观条件——理、事、情和创作的主观因素——才、胆、识、力如何达到主客观交互作用，推动创作的发展。外篇则以评论为主，主要对历代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品进行具体的艺术分析与评价，是其理论主张在具体批评活动中的延伸。《原诗》的全部精辟见解，都是围绕着“理、事、情”与“才、识、胆、力”及其关系而提出并展开论述的。

清中叶的诗歌理论以“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性灵说”为代表，几大流派同时并起，互相辩难，文学创作批评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王士禛的“神韵说”是康熙时期最大和最具影响的诗歌理论。王士禛针对学唐诗而流于形式的模仿，学宋诗而流于浅率质直，提倡“神韵说”以补救诗歌创作中缺乏真性情之弊。他所谓的“神韵”就是要求在艺术表现上追求一种清幽空寂、不着形迹的境界，强调冲淡含蓄而不失雅正的艺术风格。但是，由于王士禛过分追求典雅和神韵，“一味修饰容貌”（袁枚语），从而造成了“神韵说”丧

失了诗歌的真情实感,缺乏真正的现实生活感受和充实的思想内容。而这种文艺主张正符合易代之初清政权渐趋稳定时期统治者要求士子学人逃避现实、不问政治的文学政策,是典型的沧桑巨变之后的盛世之音,因此受到统治者的赏识。“格调”说是沈德潜的诗论中心。其论诗提倡“温柔敦厚”,认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用。沈德潜论文主张“文之与道为一”,但他更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认为“道”是“文”之根本。他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认为作者的“才”、“情”、“养”、“气”是文章创作的关键因素,因而提倡“修辞养气”,要求作者加强自身的学养,这样才能够写出敦厚醇正之文。翁方纲论诗标举“肌理说”,代表了乾嘉时期朴学家的诗学观,是对中国诗学中“以学为诗”理论的总结和发展。所谓肌理就是义理和文理的统一,是诗教政事与学问功力的结合。“义理之理”也即其所谓“文章即政事”,与乾隆所说的“诗者忠孝而已矣,温柔敦厚而已矣”如出一辙,在乾嘉考据之风兴起下,这一观点符合统治者加强文学对于封建纲常宣扬的要求。袁枚论诗提倡“性灵说”,主张抒写性灵,强调真性情,直抒胸臆,同时要求创新,对当时的拟古和形式主义的风气有极大的冲击力,使诗坛风气为之一新。“性灵说”的提出受到了明代中叶以后产生的要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的影响,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也是对当时文艺复古模拟风气的尖锐批判,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反道学、反传统的特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这一时期诗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是上述几个诗学流派书信往还,互相辩难,在论争中提出了一些颇有理论价值的诗论,使得清代诗论得以深化。沈德潜的“格调”说曾受到王士禛“神韵说”的影响,但他认为“神韵说”仅论诗之一端,故而提出了“风格”、“气骨”、“风骨”等范畴,其目的在于以“气骨”、“风格”的刚健宏放来补救“神韵”委婉徐迂之失。翁方纲的“肌理说”是王士禛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的“格调说”的一种发展和修正,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态度。翁方纲重视实际学问是为补救“神韵说”之空寂。他认为王士禛神韵说以偏概